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2, No. 1, 2026, pp.83-91.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60109sdkec>



## 论《面纱》中的生存困境与凯蒂的伦理选择

王青璐 (Wang Qinglu)

**摘要:** 英国小说家毛姆在《面纱》中通过虚构白人殖民者凯蒂和瓦尔特的生存困境，表达对英国海外殖民统治发展的关注和隐忧。凯蒂在婚姻生活中遭遇的生存困境既是西方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的性别暴力的结果，也是西方殖民系统内权力结构作用的结果。瓦尔特的生存困境指向了西方殖民系统内由权力分配问题引起的伦理混乱现状。最终，凯蒂通过伦理选择重建自我主体性，在萌生自我意识和责任意识后，获得新生。

**关键词:** 《面纱》；殖民；生存困境；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 王青璐，肇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当代小说研究。电邮：1229892149@qq.com。

**Title:** On the Survival Dilemma and Katie's Ethical Choices in *The Painted Veil*

**Abstract:** British novelist Maugham expresses his concer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overseas colonial rule in *The Painted Veil* by fictionalizing the survival difficulties of white colonizers Katie and Walter. Katie's survival dilemma in her marital life is not only a result of Western male centered gend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but also a result of the power structure within the Western colonial system. Walter's survival dilemma points to the ethical chaos caused by power distribution issues within the Western colonial system. Ultimately, Katie reconstructs her self-subjectivity through ethical choices. Having awakened her sense of self and responsibility, she attains a new lease on life.

**Keywords:** *The Painted Veil*; Colonize; Survival Dilemma; Ethical Choice

**Author Biography:** Wang Qinglu,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Zhaoqing University, research focus: contemporary novel studies. Email: 1229892149@qq.com

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被认为是认同优生学的“种族主义者”（蒋天平，胡朝霞，2023，p.55），用写作表达对“帝国前途的忧虑”（陈兵，2016，p.111）的作家。之外，毛姆的作品也被认为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被研究者指出他的作品肯定了“每个人都有存在的潜力和伦理选择”，“是简单地在‘自尊和习惯的平庸常规’中‘摆脱我们唯一的生活’，还是积极地努力欣赏和实现我们的个性和独特的本性。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坚持后者”（Adams, 2016, p.126）。小说《面纱》（*The Painted Veil*, 1925）是一部通过人物在逆境中的伦理选择和道德反思来实现自我救赎的作品。小说中，毛姆虚构了英国白人夫妇瓦尔特和凯蒂在英属殖民地香港和中国内地湄潭府遭遇的生活困境，来反映英国海外殖民统治走向衰落时期内部的混乱和无序。两人虽是殖民大军的一员，却都遭遇到统治阶层内部权力结构和话语系统的压迫。已婚的凯蒂同殖民地统治者查尔斯发生奸情既是情欲的结果，也同男权中心文化和殖民地统治系统中的暴力结构相关，其所受到的惩罚是前往危险的疫区湄潭府。瓦尔特则是在妻子的背叛和怀孕的打击下，意识到自身“男性气质”的建构失败，同殖民地男性统治者的气质不符，因而心灰意冷，选择离开人世。不同于瓦尔特，凯蒂清醒地挣脱了传统殖民话语和男权中心主义的思维禁锢，通过伦理选择努力地探寻理想的生活，完成主体建构。本研究分别从凯蒂和瓦尔特两人遭遇的生存困境切入，梳理两人的生存困境同男权中心主义和殖民地话语权力结构的关系，再通过分析两人不同的结局来认识《面纱》对西方海外殖民统治没落时期的艺术呈现。

### 一、性别暴力与凯蒂的生存困境

主人公凯蒂遭遇的生存困境同其伦理身份和所处环境中的性别暴力相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包括“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聂珍钊，2014，p.263）。凯蒂在婚前是家中待嫁的女儿，婚后是细菌学家瓦尔特的妻子，来到香港后成为助理布政司查尔斯的情妇。二人不正当关系的秘密被曝光后，她被丈夫瓦尔特带到霍乱肆虐的中国内地湄潭府，回到香港前成为寡妇。小说结尾，寡妇凯蒂独自回到英国，同父亲团聚，并一起前往巴哈马群岛。

性别暴力是现实中性别权力运作的结果。凯蒂生活在一个剥夺女性的自由和权利的环境中。毛姆写作《面纱》时，英国正经历严重的经济问题，二十世纪初期“战争带来的巨额开支导致税收大幅增加”，也有人认为，“英国在战后错失了改革本国经济结构的机会”（Macdowall, 1989, p.164）。国内的萧条，让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面临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Macdowall, 1989, p.165）。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依旧是以传统的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凯蒂在家中同母亲贾斯汀夫人形成紧密的母女共生关系。伊基·弗洛伊德研究母女关系时指出，母女双方在共生幻想中会“建立起一种镜像关系，她们通过相互依赖对方来维持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弗洛伊德，2014，p.26）。贾斯汀夫人是一位势利、“尖酸刻薄”，“支配欲极强”<sup>①</sup>（毛姆，2006，p.13）的女人。虽然她的丈夫贾斯汀先

<sup>①</sup>毛姆（2006）：《面纱》。重庆出版社：第13页。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生才是“全家的衣食来源”，但他的事业发展呈现出停滞的趋势，没法满足贾斯汀夫人。由此，把希望寄托在凯蒂、多丽丝两个女儿身上，期待给天生美人胚子的大女儿凯蒂找一个杰出的丈夫，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可由于凯蒂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夫婿，还被刚满十八岁的妹妹多丽丝抢先订婚，她就在冲动之下完成了结婚的任务，嫁给了长相平庸、社会地位较为普通的细菌学家瓦尔特·费恩。

婚后凯蒂没有及时完成同身份转变相关的自我认知改变，在随丈夫来到香港殖民地后，受到殖民地交际圈中的阶层意识影响，做出了背离妻子的伦理身份和伦理义务的行为。凯蒂在香港遭遇的婚姻问题清晰地反映出殖民地中存在的社会矛盾与阶层冲突。她在婚前曾是社交界的明星，但在香港殖民地社交圈中没有人把她真正当回事，根本原因是丈夫瓦尔特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不高。出于对丈夫，对生活的失望，凯蒂逐渐疏远了丈夫，还偷偷地和殖民地助理布政司查尔斯·唐生私通。查尔斯已经四十岁了，长相高大英俊，穿着讲究有品位，是殖民地上最受欢迎的人。有了情人后，凯蒂开始幻想查尔斯能和原配妻子多萝西离婚，再同自己结婚。她以触犯婚姻禁忌的方式，来达到成为社交界的中心的目的。禁忌的产生是“人对身上的兽性部分即人的本能加以控制的结果”（聂珍钊，2014，p.261）。殖民地上的权力秩序诱惑凯蒂不再遵守相应的禁忌，她和瓦尔特之间由婚姻缔结的亲密联盟关系被打破。在凯蒂不正当关系被发现后，遭到了瓦尔特的报复。

触犯婚姻禁忌的后果对殖民地上不同阶层的男女而言是全然不同的。秘密曝光后，来自殖民地社会结构的权力暴力同婚姻秩序中的性别暴力同时惩罚着凯蒂。不正当关系威胁了查尔斯的生活。他已经同妻子多萝西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多萝西则是殖民地贵妇的代表，其父一度官至殖民地总督。她从不把丈夫的风流韵事当回事儿，还表示愿意和查理的情人们交朋友。查尔斯享受着多萝西家族带来的政治利益，由此不敢得罪多萝西。在凯蒂到办公室请求查尔斯帮忙时，他茫然地望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张中国地图，拒绝了凯蒂的请求。由此，凯蒂也意识到自己和查尔斯虽然是破坏伦理禁忌的共谋，但始终是不平等的关系。查尔斯除了是她的情人，还是她和瓦尔特的上级、统治者。查尔斯劝说凯蒂陪瓦尔特一齐去疫区，指出只要瓦尔特能回来，就能升官发财，得到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爵的称号。另外，他还表示如果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去动用殖民地中的权力关系，请总督大人平息此事，让瓦尔特“领会权力的意思”（64）。查尔斯可以利用殖民地统治系统中的暴力结构来威胁凯蒂，瓦尔特则用主流婚姻秩序中的贞洁观念强迫凯蒂。他提出凯蒂可以留在香港，但必须先让查尔斯同多萝西离婚，再嫁给查尔斯；如果不能嫁给查尔斯，就必须陪自己前往疫区湄潭府。瓦尔特直接否定了凯蒂独自留在香港或回到英国娘家的可能，凯蒂不能独自呆在香港。而他之所以提出要一起去疫区湄潭府，是想借霍乱杀死凯蒂。

湄潭府虽然远离英国和殖民地香港，但却是一个处处存在着性别规训的符号，充满暴力关系的危险空间。在前往湄潭府的路上，轿夫有意让凯蒂在进城前看看伫立在山坡上的一座“为某位祈人多福的贤人或者贞洁的寡妇建的”（80）拱门。拱门是一个“记忆场”，“兼具实体性和精神性”（赵静蓉，2015，p.165）。在东方，拱门是道德秩序的标记。在凯蒂眼中，拱门是一种隐隐约约的威胁，在对她的嘲笑。附近的竹林里藏着什么人，正注视着她经过似的。拱门也是一道标志地理位置的边界之门，提醒凯蒂：她是因为触犯了婚姻禁忌，才被流放到远在西方现代世界之外的“蛮荒之地”。可事实上，真正导致凯蒂生活悲剧的是被权力扭曲的思想观念。直到前往湄潭府，她还企图通过丈夫来获得他人的关注和肯定，通过婚姻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被发配至远离西方文明中心的湄潭府的命运，则宣告凯蒂婚姻观和生活观的彻底失效。

瓦尔特在湄潭府感染病毒离世，怀孕的凯蒂重新回到香港。变成寡妇对凯蒂而言是不光彩的，因为她没有通过婚姻获取自己在殖民地上想要得到的地位和财富，相反丈夫的去世让她退回到起点。选择居住的酒店就能反映出凯蒂对自己的定位，在殖民地贵妇多萝西看来那里是鱼龙混杂之地，那里三教九流都有，乐队会没日没夜地演奏爵士乐。在多萝西的邀请下，凯蒂住进了曾经的情夫查尔斯的家里，结果遭到查尔斯的诱奸。之后，查尔斯还幸灾乐祸地表示凯蒂怀的孩子更像是他的，而不是瓦尔特的。他甚至还霸道地对凯蒂和她孩子进行来自父权制的主权宣告，表示希望凯蒂怀的孩子是个女孩，因为他和多萝西已经有个男孩。这让凯蒂毛骨悚然，因为她意识到，如果孩子真的是他的，自己可能终身都会受到来自查尔斯的管制，无法从男权和殖民地统治阶层的双重暴力中挣脱。最后，她准备随父亲前往巴哈马群岛，意图远离查尔斯。

《面纱》通过凯蒂婚前焦虑的择偶生活，婚后身不由己地来到疫区湄潭府，之后成为寡妇又迫不得已地回到英国的悲惨遭遇，批判了二十世纪初英国和殖民地上的社会性别伦理道德问题，也客观地呈现了女性等弱势群体在英国海外殖民系统中的边缘处境。《面纱》以凯蒂的生存困境对当时英国和殖民地的社会道德秩序和性别权力结构进行批判。除了书写凯蒂的不幸外，《面纱》还以瓦尔特的生存困境来批评当时殖民地中的伦理混乱和权力运作结构对男性殖民者的伤害。

## 二、殖民地中的伦理混乱和瓦尔特的生存困境

凯蒂的丈夫瓦尔特同样是最后惨遭失败的殖民者，其失败反映出当时的殖民活动中存在的伦理混乱的问题。伦理混乱即“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改变所导致的伦理困境”（聂珍钊，2014，p.257），“既有秩序遭到破坏、道德观念发生冲突、巧合、误解等，也同样属于伦理混乱”（聂珍钊，2014，p.258）。殖民地是伦理混乱的区域。瓦尔特在香港遭到上级的侮辱，妻子的背叛，来到湄潭府后又因妻子的怀孕陷入绝境，最后只能选择自杀来终结伦理困境。但是，瓦尔特的绝望感并非只是个人婚姻情感问题，也同社会结构和权力运作相关。妻子的婚外情和意外怀孕直接宣告了他作为英国男性殖民者、科学家的尊严与价值的消失，意味着他意图通过殖民活动获得社会地位、妻子的尊重的梦想的幻灭。

瓦尔特之所以提出让凯蒂做出选择，要么嫁给查尔斯，要么同自己去疫区湄潭府，是因为他对殖民地权力关系的认识比凯蒂的认识更为深刻，知道查尔斯不会离开多萝西。“殖民地的欧洲女性在种族警戒机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不仅维护着社会与种族边界，更通过身体存在不断提醒男性履行其种族与男性责任”（Gan，2016，p.187）。不仅是社会和种族界限的守护者，也是对男性有关种族和男性气质方面的身体提醒。妻子的不贞让瓦尔特备受屈辱，而她选择的情夫还是他无法报复的上级，这样瓦尔特倍感耻辱。唯一可能让他减轻心头屈辱的途径，就是利用海外殖民运作系统和自己的医学知识，到中国内地进行殖民活动。湄潭府的霍乱也可能帮助他杀死凯蒂，成功完成报复。所以，瓦尔特和凯蒂离开香港，前往疫区是殖民地男性权力场和殖民权力运作系统双重作用的结果。

但是瓦尔特投入其中的英国海外殖民系统在二十世纪初已日薄西山。疫区湄潭府现状惨不忍睹，是对西方海外殖民统治走向衰败的隐喻。在疫区，“人们跟苍蝇似的成堆地死掉”，法国修女等数位西方殖民者在此丧命，不少人已经从中撤出，回到西方。当地的军阀势力代表余团长则“整天忙着叫他的军队别抢老百姓的东西”（83）。城外的坟墓和城内的棺椁像在警告远道而来的西方人，他们

已经来到一个不能主宰自我命运的区域。瓦尔特等欧洲人在此处不再舒适自如，反而面临着生存的威胁。但前往湄潭府治理疫情却是瓦尔特能找到的快速晋升的途径。他在湄潭府能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也能获得了妻子和其他殖民者的肯定。尽管凯蒂在婚姻生活中看不起瓦尔特，但在国家利益层面上他们始终是一致的。所以在听到法国修女夸赞瓦尔特进行细菌研究的才华时，凯蒂会感到一阵骄傲。但是疫区紧张的生活也没能真正改善凯蒂和瓦尔特之间的关系。

在凯蒂眼中，瓦尔特的男性气质没有因为其拥有的医学卫生知识而得到增强。两人来到湄潭府后继续过着同床异梦的生活。在瓦尔特投入工作时，凯蒂得到了长期驻留此地的官员韦丁顿的陪伴。韦丁顿是一个睿智、善良、友好的英国人，长着高高圆圆的额头，“脸很像猴子的脸”，“活像一个老男孩儿”，喝酒时“颇像一个酒过三巡的好色之徒”（85）。韦丁顿没有查尔斯那般的地位和男性魅力，但在湄潭府却有一个温文尔雅，有贵族气质、教养的满洲情人。韦丁顿同满洲女人之间的同居关系与瓦尔特和凯蒂的婚姻关系构成一对镜像。两对男女之间的生活都是悲剧性的：瓦尔特、凯蒂的婚姻名存实亡，韦丁顿和满洲女人虽然同居却没有子嗣。韦丁顿的婚姻故事也构成了对《面纱》中性别暴力和殖民地统治暴力的补充。

韦丁顿和满洲女人的无子生活模式契合作家毛姆的优生学理念，迎合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刻板印象。在西方人眼中，东方民族始终是劣于西方的低等民族。例如在凯蒂眼中，湄潭府的中国孩子都是形象丑陋、怪异的，“不像人类，而是某种罕见的不知名的动物”，“活像一堆小虫子”，“面黄肌瘦，身同侏儒，鼻子都是扁扁的，几乎没有正常人的模样，一看便令人生厌”（113）。之外，在西方殖民者对东方的形象建构中，“整个东方都被意指为女性化的符号，且总是带着面纱，充满诱惑和危险”（张颖,2018,p.11）。韦丁顿和满洲女性的故事体现了作者毛姆的殖民理念和东方观。尽管韦丁顿不能吸引同为白人的凯蒂，但他却对贵族出身的满洲女人产生了神秘的吸引力，能令她能为韦丁顿不顾一切地私奔。

韦丁顿对满洲女人产生的神秘的吸引力同瓦尔特对妻子凯蒂的失败管束，形成对照。作为殖民者的妻子和英国人的女儿，白人女性凯蒂同样被“期望体现一种无性的纯洁和美丽”（玛玛,2018,p.230），遭遇到来自西方白人男性的凝视。研究者指出西方人在面对东方人时，会产生尚古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妇女的缠足，还有非洲的割礼以及中东的面纱”，东方被认为“代表一种静止状态”（肖丽华,2013,p.26）。小说中就出现了韦丁顿让太太取出一只漂亮的满洲鞋让凯蒂试穿的情节。凯蒂穿上鞋子后，发现韦丁顿脸上露出了坏笑，就问这双鞋对于韦丁顿夫人会不会太大。韦丁顿回复说“大了去了”（160）。试穿东方鞋子的场面构成一幅尚古的画面，而白人女性凯蒂被韦丁顿为代表的西方男性纳入到尚古的场景中，成为他们品鉴的对象。凯蒂同东方女性一样被放置于西方男性的对立面。

韦丁顿同满洲女人的婚姻表面上是和谐的，实际和瓦尔特同凯蒂之间的婚恋关系一样，都隐藏着暴力倾向，绝不是“《面纱》中唯一一对和谐美满的夫妻”（余云，2016，p.152）。在凯蒂的观察中，满族女子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人偶”，操控者就是她的丈夫韦丁顿。韦丁顿告诉凯蒂，他的妻子会有节制地抽鸦片，而他的职责就是禁止鸦片交易。根据美国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韦丁顿的叙述属于“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判断。历史上，十九世纪末英国人为代表的西方列强以鸦片荼毒中国人民，霸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资源，所以韦丁顿的描述是歪曲事实的。他否定了二十世纪初英国人在东方制造的罪行，反而美化了英国人在东方的活动。另外，韦丁顿的话

语内容也可能在掩饰一个真相：即韦丁顿是通过鸦片的力量来控制美丽的满洲贵族女子，弥补自己的男性气质缺陷。

韦丁顿的故事指向殖民地权力结构中的暴力性因素的在场。瓦尔特的悲剧也同殖民统治相关，因为他始终没有获得殖民权力系统的接纳。湄潭府的生活经历推动了他的梦想的幻灭，也将他置于深渊。凯蒂则在湄潭府变得比瓦尔特更为成熟，能够更准确地认识到他们在海外殖民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她意识到他们的处境就像“学习某种外国话的时候，读完了一页文章你却根本不知所云：直到一个单词或者一个句子启发了你”（73）。他们其实一直被排斥在殖民统治势力的核心圈子外，没有被海外殖民统治的主体接纳。瓦尔特逼迫凯蒂随自己来到疫区，以为能改善关系。凯蒂的怀孕却真正宣告了瓦尔特作为丈夫和男性殖民者的失败。他既无法像查尔斯同殖民地贵妇多萝西结成牢固的联盟关系，也韦丁顿利用鸦片控制满洲女人的能力。所以无法忍受屈辱和痛苦的瓦尔特最后选择主动感染霍乱、离开人世。

瓦尔特的离世去为凯蒂敲响警钟，帮助她更清晰地直面个体在殖民系统支配下前的处境和命运。凯蒂去看遗体时发现离世的瓦尔特“就像一个停下里的机器”。她发觉“那才是可怕之处。如果他只是一具机器，那么所有这些病态、心碎、苦难，有都算得了什么呢？”（183）。他们不远万里地来到湄潭府，推动了英国海外殖民进程的发展，但却不能真正地改善个人的生活，反而还陷入了悲惨的处境中。从丈夫的管控中挣脱出的凯蒂也没有为他哭泣，因为她再也不想惺惺作态、悖逆心愿了。她认为自欺是不可饶恕的。

### 三、凯蒂的伦理选择与主体重塑

亚当斯认为毛姆的作品传达了一定的道德内涵：“心是我们必要本性的所在；我们的生存和道德挑战不是去改变这种自然”，“而是去理解和欣赏它，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它的积极情绪中受益，限制它的消极情绪的破坏性影响和潜在力量”，而“这是一项由人类的头脑完成的理性的任务”（Adams, 2016, p.126）。在《面纱》中，凯蒂和瓦尔特在面对现实生存困境带来的沮丧情绪时采取不同的态度。瓦尔特在绝望之际选择感染病毒离世。凯蒂则清醒地意识到她和瓦尔特同查尔斯为代表的海外殖民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不平等关系，即使他们做出牺牲，也无法获得查尔斯为代表的海外殖民统治主体的肯定。认清现状后，凯蒂在困境中“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做出了“道德选择”，既伦理选择（聂珍钊，2014，P.267）。她改变了对东方的刻板印象，学会去理解和欣赏自己的处境，真诚地告诉瓦尔特他不是孩子父亲的真相。回到英国后，凯蒂还同父亲修复关系，随父亲前往巴哈马群岛追逐想象中更为自由、平等、和谐的生活。

凯蒂做出伦理选择的过程也是人物内心成长，主体重塑的过程。来到湄潭后，凯蒂开始从男性殖民统治者的知识话语统治中挣脱而出，力求重获对身体的支配权，以重塑自身的主体性。首先，她不顾细菌学家瓦尔特的劝阻，故意“逞能”吃中国厨师做的沙拉。情夫查尔斯也曾告诫她在湄潭不要吃没煮熟的东西，尤其是不干净的水果和沙拉。凯蒂吃生菜沙拉的做法确实鲁莽，但蕴含了反抗精神，是其想要争取独立性的表现，既要向瓦尔特报复，“也是在嘲笑自己心中的恐惧”（97）。

其次，凯蒂还通过参加劳动重塑自己的主体性，减轻对男性的依附，在劳动中重新寻回自己的价值。尽管在西方殖进程程中，法国修女们是英国殖民者的竞争对手，但在霍乱时期，修道院提供了让凯蒂探索自己的空间。她在修道院中临时顶替已故的圣弗朗西丝姐妹，帮忙照看修道院年岁较

小的孩子。在劳动的过程中，凯蒂感觉自己在不断地成长。她接触到了新的生活，新的观念，活力又回来了。劳动让她意识到自己可以不依附男性生活，也让她暂时忘记同情夫查尔斯·唐生之间不光彩的往事，发现自己有摆脱男权社会的束缚的可能性。

修道院中的工作帮助凯蒂形成更为独立的自我意识，让她能够从殖民话语的规训中挣脱出来，更客观地看待长期被殖民宣传妖魔化、他者化的中国形象。黄丽娟也同意“凯蒂在梅潭府死亡威胁的状况下，放眼周遭，心生同情，灵性生命被唤起，发生了第二次蜕变”（黄丽娟，2022，p.43）。中国风光不再充斥着恐怖的死亡阴影，而是以清新、美丽的景象出现在凯蒂眼前。她见到的农舍、竹林风光都相得益彰，十分养眼。凯蒂对中国孩子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最初在她眼中，中国孩子是“某种罕见的不知名的动物”，一堆“虫子”（113），随着在修道院工作的深入，她不再以妖魔化的眼光去看待“丑孩子”为代表的东方人，而是赋予他们和瓦尔特等西方人平等的地位。

法国修女主持的修道院也让凯蒂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在海外殖民系统中的微不足道，加速推动凯蒂心中同殖民话语系统相关的信仰的幻灭。瓦尔特离世后，她尝试申请留在修道院中工作。可凯蒂始终无法成为其中一员，也无法同修女们结成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她感受到修道院像另一个世界，一个超然于宇宙之外的世界。凯蒂同湄潭府法国修女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对英、法两国在二十世纪初海外殖民进程中的政治较量的隐喻。法国修女主持的修道院空间是一个排斥其他欧洲国家公民，彰显法兰西国家民族利益的权力场域。历史上，基督教传教在帝国的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南亚原本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人死后，法国修女们即刻赶来建立修道院”，“试图夺取英国在当地的公共卫生权力”（蒋天平，胡朝霞，2023，p.54）。尽管贵族出身的院长在凯蒂眼中是慈祥的化身，实际上伪善的院长对凯蒂充满戒备，因为修女为代表的法国殖民者不欢迎凯蒂等英国人驻留此地，同法国殖民势力竞争。

凯蒂从东方文化中获得思想启发，打破了西方殖民话语对其影响。东方对凯蒂、韦丁顿等西方人产生的积极作用，东方的思想文化可以帮助西方人更好的生活，研究者也认为小说反映了“西方知识分子向异域的‘他者’文化寻求改变欧洲衰败倒退之方的人道主义情怀”（黄丽娟，2022，p.41）。韦丁顿向凯蒂介绍了中国的道家思想，指出道家思想“能使我们从对这个世界的嫌恶中解脱出来的，就是纵使世事纷乱，人们依然不断创造出来的美的事物”，“其中最为丰饶的美，就是人们美丽的生活”（184）。凯蒂在东方生活工作后，意识到人类和河中的水滴一样，都在永不停歇地流走，直至汇入大海。生命如流水般短暂易逝，所以人们不应该为了区区小事互不相让，两败俱伤。人与人是如此，不同种族之间也是如此。东方智慧能帮助凯蒂从英国帝国殖民统治推行的狭隘的思维局限中挣脱出来，让她对生命有更为多元、宽泛的理解。

推动凯蒂完成主体重塑，收获独立性的是怀孕事件。凯蒂怀孕后，瓦尔特前来问询孩子的父亲是谁。凯蒂意识到答案的重要性：如果她说了是，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新的世界来临了。他会相信她。相反如果凯蒂说出情夫查尔斯才是孩子父亲的真相，他们的婚姻就会直接走向终结，她也会面临更多的舆论危机。因为她知道自己不爱瓦尔特，在说真话之外，她别无选择。凯蒂只能直面两人的矛盾和冲突。秦宏指出，在毛姆看来“偷情是一桩过错，婚姻的枷锁把两个人捆绑在一起渡过漫长的一生那才是真正恐怖罪恶的事”（秦宏，2008，p.103）。适当的撒谎或许能够保障凯蒂的生活，但她依旧选择诚实回答，坦荡地面对人生。

母亲的身份也赋予凯蒂新的认知，帮助凯蒂反思自己同父母的关系，思考随母亲身份而来的伦

理责任。她不再认同母亲贾斯汀夫人灌输的功利主义思想，既通过婚姻来获取名利。女权主义者认为“母性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严重障碍”，但在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看来，成为母亲并拥有保护自己子女的权利就“具有了抵抗殖民的意味”，“夺回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主宰自己种族繁衍的权利”（肖丽华，2013，p.35）。凯蒂在怀孕的过程中意识到“男人是多么愚蠢啊！他们在生养儿女的过程中扮演的是如此微不足道的角色，是女人怀胎十月，历尝辛苦，最后在痛苦中妊娠生产”（155）。凯蒂的女性意识萌生，让她对后代产生了责任感，不希望孩子会重复自己的错误。她表示要让孩子成为自由的人。回到英国，凯蒂与父亲重逢，修复了父女关系，同父亲一起前往巴哈马群岛。

### 结语

小说《面纱》通过虚构英国殖民者瓦尔特、凯蒂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殖民者个体同西方海外殖民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客观呈现了二十世纪初英国海外殖民统治的黑暗和衰落。如果说凯蒂的遭遇侧重于反映二十世纪初殖民系统内的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生存权力和自我价值实现机会的剥夺，瓦尔特的悲惨结局则是对英国殖民统治内部权力结构的不平等性的控斥。凯蒂在困难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体现出她所具有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反思意识。小说也借凯蒂和瓦尔特的遭遇为读者带来有关人生和婚姻的启发。

**基金项目：**肇庆学院 2025 年青年教师科研资助项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老年书写研究”（qn2025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与对外传播研究”（21&ZD2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Wang Qinglu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9-9959-0330>

### References

- Adams, Don (2016): “‘What then is right action?’: Somerset Maugham's ethical parables.” *Sounding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105-135. DOI: <https://doi.org/10.5325/soundings.99.2.0105>
- 陈兵 (2016): “责任与疆界: 毛姆东方故事中的英国绅士与帝国”, 《外国文学》(04): 109-117。  
[Chen Bing (2016): “Responsibilities and Boundaries: The English Gentlemen and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Oriental Tales of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Foreign Literature* (04):109-117. DOI: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2016.04.012>]
- 弗洛伊德 (2014): 《厄勒克特拉 VS 俄狄浦斯: 母女关系的悲剧》, 蔺秀云译。漓江出版社。  
[Freud, Hendrika C. (2014): *Electra vs Oedipus: The Drama of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translated by Lin Xiuyun.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 ]
- Gan, W (2016): “*The Painted Veil*: Re-inventing the Colonial Woman and the Hinterland Narrative.” *Middlebrow and Gender, 1890-1945*(26): 187-201. DOI: <https://doi.org/10.1016/j.jfa.2013.05.025>
- 黄丽娟 (2022): “毛姆《彩色的面纱》的跨国现代主义解读”, 《外国语文》(04): 40-47.

- [Huang Lijuan (2022): "Transnational Modernism in Somerset Maugham's *The Painted Veil*."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4): 40-47.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6414.2022.04.005>]
- 蒋天平, 胡朝霞 (2023): "帝国的悲歌: 毛姆《面纱》中的生物政治学和殖民医学", 《英语文学研究》(01): 52-66。
- [Jiang Tianping, Hu Xia (2023): "An Elegy for Empire: Biopolitics and Colonial Medicine in Somerset Maugham's *The Painted Veil*." *Stud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01):52-66. ]
- 玛玛, 阿米娜 (2018): 《面具之外: 种族、性别与主体性》, 徐佩馨, 许成龙译。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 [Mama, Amina (2018): *Beyond the Mask: Race, Gender and Subjective*. translated by Xu Peixing, Xu Chenglo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
- 毛姆 (2006): 《面纱》, 阮景林译。重庆出版社。
- [Maugham (2006): *The Painted Veil*. translated by Ruan Jinglin. Chongqing Publishing & Media Co., Ltd. ]
- McDowall, David (1989):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Logman.
- 聂珍钊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 [ Nie Zhenzhao (2014):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 秦宏 (2008): "毛姆作品中呈现的悲观偏激的婚姻观", 《长沙大学学报》(03): 101-103.
- [Qin Hong (2008): "The Pessimistic and Extreme View of Marriage Presented in W. Somerset Maugham's Works." *Journal of Changsha University* (3):101-103.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4681.2008.03.038>]
- 肖丽华(2013): "在姐妹情谊之外: 论后殖民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方法论之争",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 23-27。
- [Xiao Lihua (2013): "Outside of Sisterhood: About the Methodological Disputes of Postcolonial—Feminism and 'Feminism'."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 (Liberal Arts Edition)* (2):23-27.]
- 余云 (2016): "《面纱》: 病态中产阶级家庭文化下的人物命运",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8): 150-163。
- [Yu Yun (2016): "*The Painted Veil*: Character Destinies Under the Pathological Culture of the Middle-Class Family."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18):150-163. DOI: <https://doi.org/10.13916/j.cnki.issn1671-511x.2016.s1.053>]
- 赵静蓉 (2015):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Zhao Jingrong (2015): *Cultural Memory and Identity Recognitio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张颖 (2018): "解构‘面纱’的多重迷思:来自非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后殖民批判", 《当代文坛》(3): 169-175.
- [Zhang Ying (2018): "Deconstructing the Multiple Myths of the *the Painted Veil*: Postcolonial Critiques from Non-Western Feminists." *Modern Literary Magazine* (03):169-175. DOI: <https://doi.org/10.19290/j.cnki.51-1076/i.2018.03.027>]